

论交融型社会资本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构 ——基于湖南省 X 乡的微观机制研究

舒 聪

（南开大学，天津市，300350；1392043715@qq.com）

摘 要：多民族杂居格局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对国家治理构成深层挑战，面对多元民族关系的复杂性，微观层面的社会互动机制成为破解这一难题的关键。以湖南省 X 乡为例，交融型社会资本通过“嵌入—赋能”机制嵌入民族交往实践，实现资源与能力的微观赋能，奠定跨民族互动的信任与文化基础；继而以“情感—认同转化路径”推动情感联结向身份认同的递进转化，促成政治、文化与心理认同的融合。这一过程依托正式制度、非正式网络、共同价值观及社会信任的交互，体现为社会资本从结构功能向精神力量的升华。在多民族治理常态化情境中，交融型社会资本本质上是化约社会复杂性的一种路径，其成效仰赖制度与网络的协同赋能，并通过深化社会资本的文化与情感功能，可超越传统工具理性的局限，为民族团结与共同体建设开辟微观驱动的新道路。

关键词：社会资本理论；交融型社会资本；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嵌入—赋能机制；情感—认同转化路径

引言

社会资本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构的微观动力。

2014 年 5 月召开的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在中国民族政策贯彻落实且不断发展的进程中具有重要意义。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首次阐释了“高举各民族大团结的旗帜，在各民族中牢固树立国家意识、公民意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战略思想[1]。这一论述在随后的党的十九大报告中被进一步凝练并确立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国家战略目标[2]。作为一个拥有多元民族构成的统一国家，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构建不仅对于维护国家的长期稳定与安全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而且在推动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进程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有鉴于此，探索并确立科学的实践路径以巩固和深化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已成为当前亟待解决的重要议题。

然而，学术界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研究迄今多聚焦于四个方面的研究：（1）横向分类拆分政治、经济、文化等模块；（2）纵向历史追溯渐进积淀，诉诸过去—现在—未来”的潜在思维线索；（3）差序格局含境内各族、港澳台及海外华人三层认同；（4）以点带面地聚焦研究深挖特定群体、场域及政策等[3]。研究发现鲜有学者深入探讨微观社会互动机制的内在逻辑——特别是社会资本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生成与发展中所发挥的关键作用。正如陈纪教授在研究和谐民族关系构建时所指出，既有研究往往围绕与“和谐”相关的外部条件展开论述，而较少从“民族关系”自身发展的内在现实条件出发审视其构建过程[4]，这一局限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研究的深度与广度，陈纪教授也认为，学界少见从社会资本建设角度研究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而为数不多的现有研究则普遍认同社会资本促进少数民族融入、民族团结及交往交流交融[5]。

因此，在多民族杂居的复杂社会治理环境中，如何有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并推动民族共同体的建设，已成为学术界亟需正视的关键问题。在此背景下，社会资本作为连接个体与群体关系的重要资源，其在促进民族团结、增强社会信任以及完善社会规范方面的作用显得尤为重要。社会资本理论为此提供了一个有力的分析视角，通过系统考察社会网络、信任机制和规范体系等要素，不仅能够加深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机制的理论理解，还能为其实践路径的探索提供科学的指导和切实可行的策略支持。

1 社会资本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理论框架与分析视角

本文基于社会资本理论，试图构建以“交融型社会资本” (Integrative Social Capital) 为核心的理论框架，系统阐释其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构中的作用机制。该框架以“嵌入—赋能机制” (Embedding-Empowerment Mechanism) 和“情感—认同转化路径” (Emotional-Identity Transformation Path) 分别提炼社会资本的生成逻辑与心理递进路径，旨在揭示其从资源整合到意识内化的动态作用。

1.1 社会资本理论的多元解读与本文定位

社会资本理论自问世以来，已成为社会科学研究关注的焦点，学者们从不同维度赋予其丰富内涵。布尔迪厄 (Bourdieu) 将社会资本界定为嵌入社会关系网络的资源集合，强调其助力个体获取群体资源的潜能[6]；科尔曼 (Coleman) 聚焦其功能性，视其为促进个体行动的社会结构资源，体现于义务、信息与规范等层面[7]；普特南 (Putnam) 将其拓展至政治领域，突出信任、规范与网络在提升社会效率中的作用，其认为，“社会资本的存量，例如信任、规范和网络，往往具有自我强化和累积的特性。良性循环会导致高水平的合作、信任、互惠、公民参与和集体福祉的社会平衡。相反，恶性循环则会导致这些特征水平低下的社会平衡。”[8]；林南 (Lin) 则从投资回报视角出发，强调其在信息流动与身份强化中的功能[9]。这些研究共同揭示了社会资本作为关系性资源在社会合作与发展中的工具性价值。然而，传统理论多囿于“工具理性”框架，忽视其在文化认同与情感联结中的深层作用。本文突破这一局限，将社会资本重构为兼具文化资源与精神力量的复合性要素，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成紧密关联，拓展其理论深度与实践意义。

1.2 “嵌入—赋能”机制：社会资本的运作逻辑

在本理论框架中，“嵌入—赋能”机制揭示的是社会资本如何通过融入民族交往、交流与交融的实践场域，为个体和群体提供资源与能力支持，从而推动共同体意识的形成。这一机制的核心在于制度与网络的双重嵌入作用。具体而言，正式制度作为国家意志的体现，例如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为跨民族互动搭建了宏观框架并提供了保障，确保政治参与和经济发展的制度性基础；民族政策与法律法规则进一步规范行为，维护互动的有序性。与此同时，非正式网络依托血缘、地缘、业缘等关系纽带，在微观层面构建起日常互动的平台，通过频繁的接触逐步消解民族间的隔阂，增进相互理解与信任的积累。两者相辅相成，共同推动了跨民族互动在日常生活交往、经济合作及文化融合等多重场域的展开。这种互动使得资源共享、经验交流和信任建立成为可能，从而为共同价值观的孕育和社会信任的巩固奠定了结构性条件[10]。

1.3 “情感—认同转化路径”：社会资本的心理递进

“情感—认同转化路径”对认知性社会资本如何依托“嵌入—赋能”机制进行了梳理，从情感联结递进至身份认同，推动共同体意识的内化与实践：民族间共同价值观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及命运共同体理念为代表，共同价值观为各民族成员提供价值共鸣的基石，引导行为一致性，减少互动摩擦，强化合作基础。而“社会信任”作为认知性社会资本的核心因素，其通过降低交易成本、加速信息流通与增强网络联结，催化跨民族互动的深化，普遍信任与制度信任的建立尤为关键。共同价值观与社会信任协同促成情感联结，通过共情、情感依附及集体体验将不同民族成员的心灵联结为一[11]。这一联结驱动认知重构，消解刻板印象，建构共同记忆，使“他者”视角转向共同体认知；继而促进行为整合，表现为合作模式形成与文化适应，最终实现个体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完成意识的内化与外化。

本文以“交融型社会资本”为核心，整合“嵌入—赋能”与“情感—认同”两大维度，构建动态循环框架（如图1所示）。这一框架不仅揭示了社会资本从资源嵌入到意识转化的完整逻辑，还强调其相互促进的反馈机制：共同体意识的深化反过来强化社会资本的积累，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持续巩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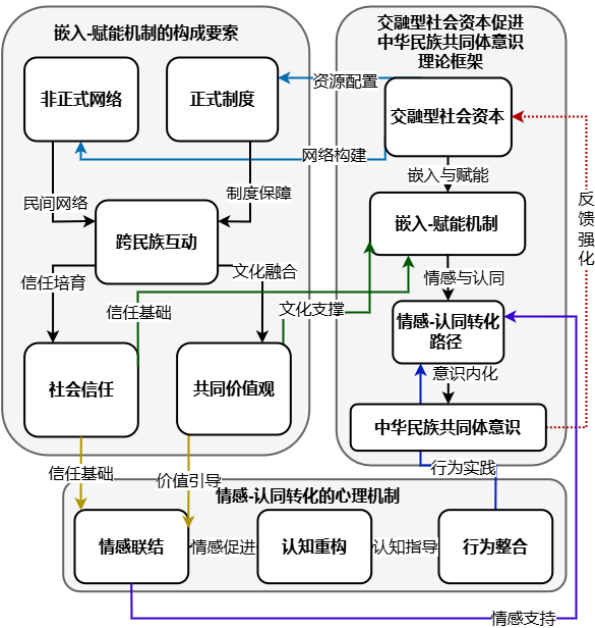


图 1 交融型社会资本促进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理论框架

2 “嵌入—赋能”机制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X 乡的实践逻辑

湖南省 X 乡地处怀化市西部，该市拥有汉族、侗族、苗族、瑶族等 51 个民族，少数民族人口 218 万，占全市总人口 42%，约占全省少数民族人口的 30%。全市下辖 5 个少数民族自治县、2 个少数民族人口过半县及 19 个民族乡。其中 X 乡虽未被划为民族乡，但据当地党委书记及统计数据，其常住人口约 80%为少数民族，以瑶族为主，兼有土家族、苗族等[12]。尽管民族构成复杂且少数民族占比高通常被视为基层治理的挑战，X 乡多年来却维持了有效治理，未发生恶性事件，并于 2022 年获评“全市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为剖析其治理模式，本研究依随机抽样原则访谈 15 位居民，包括村民、L 村村支部书记及退休的 X 乡前人大主席，其中瑶族 9 人、汉族 6 人。

2.1 正式制度：国家意志的结构性保障

1996 年，厄普霍夫（Uphoff）在他的《Learning from Gal Oya : possibilities for participatory development and post-Newtonian social science》中将社会资本中“相对客观的，表现为一种可见的形式”的类型称为“结构性（structural）社会资本”[13]，结构性社会资本依赖现实中存在的规则、先例以及程序等因素而建构出一种无形的“角色与社会网络”[14]，进而对群体进行有意识的规范和引导达到实现集体利益的目标。其中正式制度便是结构性社会资本的重要组成，其作为国家意志的体现，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提供了宏观制度框架与保障。据 X 乡 L 村村支部书记所述，当地政府贯彻“少数民族文化保护与发展政策”，每年拨款 2-3 万元支持民俗活动，并通过“敲门行动”等形式宣传政策，维护少数民族权益。这一制度实践不仅推动了民族地区的经济与社会进步，还强化了各民族成员对国家认同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

访谈实录（图 2）：

问：乡镇和村委会有没有举办一些活动呢，活动中少数民族的参与情况怎么样呢？

X 乡 L 村村支部书记（汉族）：有的，县政府每年都会定期拨款给各个乡办活动的，乡政府就会把拨款啊，给村里去办，我们村每年会办唱山歌活动啊。我们这块的人，平时没什么休闲娱乐，就喜欢唱歌跳舞，我们就搞个活动，把他们聚在一块，让大家唱唱歌跳跳舞，比较快活。其实就算村里不举办，他们自己也会自发的搞活动，只是政府搞的活动要热闹一些，还有就是每年六月十八，七姓瑶族会有庙会，那个时候也蛮热闹的呢。大家参加的情况，大家都来了，什么民族都有，汉族啊，瑶族啊，苗族，他们都来，这个交往还是很密切的。



图2 与X乡L村村支部书记交谈

上述叙述表明，政府主导的文化活动不仅丰富了村民生活，更关键在于搭建了跨民族互动的平台，促进了理解与信任的累积。这种制度嵌入为交融型社会资本的生成提供了结构性支撑，潜移默化中将地方认同升华为国家认同，为“情感—认同转化路径”奠定了基础。

2.2 非正式网络：传统规范的微观渗透

非正式网络在微观层面为民族交往提供了日常互动场域，显著增强了跨民族信任与理解。在X乡，此类网络体现为瑶族七姓族长调解机制、自光绪三年延续的通婚传统及民间自发的歌会舞会。这些植根于地方传统的网络，通过规范与约束功能，潜移默化地塑造了村民的价值与行为模式。访谈显示，族长在纠纷调解中扮演关键角色，其威望与先例规范使矛盾多在民间化解，而汉族居民亦主动融入这一网络，凸显社会资本的跨界性。

访谈实录：

问：我听咱们书记讲，咱们村有苗族族长，他们会处理一些矛盾，是这样吗？涉及到汉族的矛盾会怎样解决呢？

X村汉族村民：啊是的，是有他们的族长解决一下啊。（这些）都不是什么大矛盾，什么鸡到别人家院子不见了啊，小孩打架啊，有时候自己解决就好，（解决地）不好就（请）他们来一下，汉族也一样的，汉族不怎么多，而且我们也比较信他们，都会听的，没有什么不一样，这一套一直就是这样，大家都习惯。

汉族居民对少数民族规范的接纳，反映了非正式网络在消解民族隔阂、促进文化认同与情感联结中的作用，为交融型社会资本的微观积累提供了文化土壤，推动了共同体意识的生成。

正式制度与非正式网络的双重嵌入共同促成了X乡跨民族互动的深化，为社会资本的积累与转化创造了条件。活动如“山歌屋歌文化交流”、“六月十八庙会”等等，为不同民族提供了互动契机，奠定了信任与价值观塑造的实践基础。

2.3 共同价值观与社会信任：认知性社会资本的培育

在厄普霍夫的理论中，除了上文所述的结构性社会资本以外，还存在一种“认知性(cognitive)社会资本”，根据厄普霍夫的理论，认知性社会资本主要涉及社会成员之间的信任与价值观等认知元素，它具有较强的主观因素，已内化于心而存在于人民的大脑。这些元素在社会成员之间建立起一种共享的理解和期望，扮演了一种抹除信息不对称，减少信息差以构建信任走廊的方式从而减少社会矛盾。共同价值观与社会信任作为认知性社会资本的核心，也是“嵌入—赋能”机制的产物，亦是“情感—认同转化路径”的起点。Stolle和Harell的研究表明，共同价值观能够促进社会成员之间的信任和合作，减少文化冲突和隔阂。他们观察到，“在移民社会中，拥有共同的价值观和规范显著增强了跨民族的信任和合作。这些共同的价值观……使来自不同民族背景的个体能够进行有意义的互动，并建立相互信任[15]。”在X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通过宣传渗透村民观念，

提供价值共鸣基础；社会信任则依托制度保障与网络联结，在族长权威认同与跨民族互助中得以体现。二者协同为跨民族互动注入信任与情感动力，推动了共同体意识的内化。

3 “情感—认同”转化路径：X 乡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成

“情感—认同转化路径”构成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构的核心机制，阐释了认知性社会资本如何依托“嵌入—赋能”机制，推动共同体意识从外在实践向内在认同的深层转化。X 乡的实践经验为解析这一路径提供了鲜活的实证依据。

3.1 情感联结：跨民族互动的情感基石

共同价值观与社会信任的形塑，为跨民族互动注入了情感联结的动力。作为身份认同的前提，情感联结通过共情体验、情感依附及集体情感的共享，将不同民族成员的心灵交织为一，为后续的认知重构与行为整合奠定了心理基础。在 X 乡，无论是青年男女借歌会舞会相识相知，还是不同民族通过通婚缔结家庭纽带，抑或村民间的日常互助，皆彰显了跨民族互动所孕育的情感联结。

访谈实录（图 3）：

问：请问您有了解其他民族吗？有其他民族的朋友吗？您和您的朋友是怎么认识的？

X 村瑶族村民：了解不了解我讲不清楚，不过朋友三四（指朋友）我还是有的，还有亲家也是其他民族的（据此后询问，指汉族）。我和我阿娘（指妻子）那一年在歌会上碰到的，我俩相互之间唱歌跳舞，就看上眼了，看上眼了屋里觉得没有什么问题，女方那边就来男方这里住三天，没有问题的话就结婚了，结婚了以后就自然认识了好多朋友，我们这边好多这样抬亲（指结婚）的，其实有些之前和他们唱歌的时候就认识了，反正生活的也这么近，大家来来往往就认识了。



图 3 与 X 乡瑶族村民交谈

此番叙述生动揭示了歌会舞会作为跨民族互动媒介，如何促成青年男女间的情感联结，并通过通婚升华为家庭层面的情感认同。这种联结不仅构成了“情感—认同转化路径”的起点，更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成提供了情感根基。

3.2 认知重构：从“他者”到“我们”的观念跃迁

情感联结驱动认知重构，促使个体重新审视并理解不同民族的文化习俗与生活方式，进而消解刻板印象、建构共同记忆，将“他者”纳入“我们”的认知框架。正如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在《想象的共同体》中所述，民族乃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16]，其根基并非客观的血缘或地缘，而是共同的文化认同与情感联结。认知重构即是将这一“想象”内化为个体认同的过程。在 X 乡，长期的民族交往交融促成了文化习俗的相互理解与生活方式的渐进融合，甚至改变了某些极端传统。例如，建国前后，瑶族视“孝”为至高价值，严

重不孝者曾被送至邻县C地处以火刑，此与汉族“孝道”相近却手段极端。民族交融中，双方的“孝”文化逐渐趋同，至改革开放后，瑶族火刑习俗彻底废止。此过程不仅体现了文化碰撞与融合的动态演进，亦是基层身份政治的实践缩影——身份认同深刻影响政治行为与诉求。在X乡，跨民族互动逐步孕育了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知认同，使个体超越狭隘的族群界限，将自我认知扩展至共同体层面，完成了从“他者”到“我们”的观念跃迁，为“三位一体”认同奠基。

3.3 行为整合：政治、文化与心理认同的统一

认知重构最终落实于行为整合，即通过一致的行为模式与社会参与，将共同体认同内化为自觉实践，并整合为一种被普遍接受的“规范”——个体或群体在社会互动中遵循的非正式规则、预期和行为准则。这种被整合而形成的规范通常是通过社会学习和文化传承形成的，正如 Humnath Bhandari 和 Kumi Yasunobu 在其研究文章《What is Social Capital? A Comprehensive Review of the Concept》中所讨论的，“这些规范是社会群体内部指导行为的共同期望和规则，帮助创造一个稳定和可预测的社会环境，促进合作和信任[17]。”而在X乡，此规范主要体现为一套被多民族认可的矛盾处理机制得以被遵循与认同，如下图4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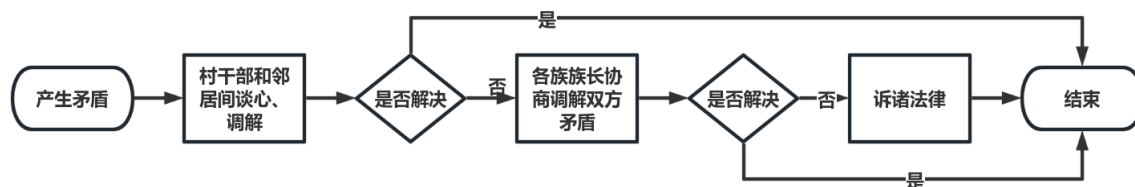


图4 X乡矛盾调解机制示意图

访谈实录：

问：面临较难解决的矛盾，在调解无果以后有哪些方法维持乡镇的和谐呢？大家又是否都遵守这些规矩呢？

X乡L村村支部书记（汉族）：在政府调解的同时，少数民族那边有自己的有时候他们氏族里面还有族长会牵头来解决，但是这些年基本上没有什么矛盾。这些族长都是某一姓中比较有威望的人，大家也比较服从，还有一些就是传承下来的一些乡里自己的习俗啊，都会遵循的。如果实在还不行的话就会走法律程序了，先和县里的领导讲，然后该走什么程序走什么程序，这没得说的，但是一般到不了这一步，只是至少让大家心里有个底，晓得那些做的，哪些做不得。

问：之前听大家讲，我们村处理这个矛盾都是按这么一套流程下来咯，那我们自己内心里面有没有比较信服这个流程，还是说村民觉得应该怎么规范会好一些？

X乡瑶族村民：我矛盾处理的不多，不是蛮清楚，但是我看其他屋里有什么矛盾啊，基本上上升不到法律那个面上去，乡里人聚拢讲一下，我们族长讲下话，大家就听了的。讲句不好听的，大家敢不听你讲，基本上矛盾就那几条，以前好多处理好的，你不听，还要乱搞，到时后村里搓你后背心（背后议论）你都不晓得。以后有什么事，比如讲盖瓦（修房子），杀猪也没人来帮你，那还是比较老火（糟糕，麻烦）的。其实都是一个村的人，没有必要不信服，这样的规矩大家心里都晓得的。

村民对矛盾处理流程的接纳，反映了社会规范在长期互动中被内化为行为自觉，而非仅源于外在压力。此自觉不仅体现为对地方规范的遵循，更扩展至对国家法律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践行，最终促成了政治认同（对制度与政策的认同）、文化认同（对传统与规范的认同）及心理认同（对共同体的归属感）的“三位一体”融合。

X乡的经验表明，“情感—认同转化路径”以“嵌入—赋能”机制为依托，通过共同价值观与社会信任的形塑，促成情感联结、认知重构与行为整合的递进，最终实现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化与实践。这一路径的实践逻辑如图5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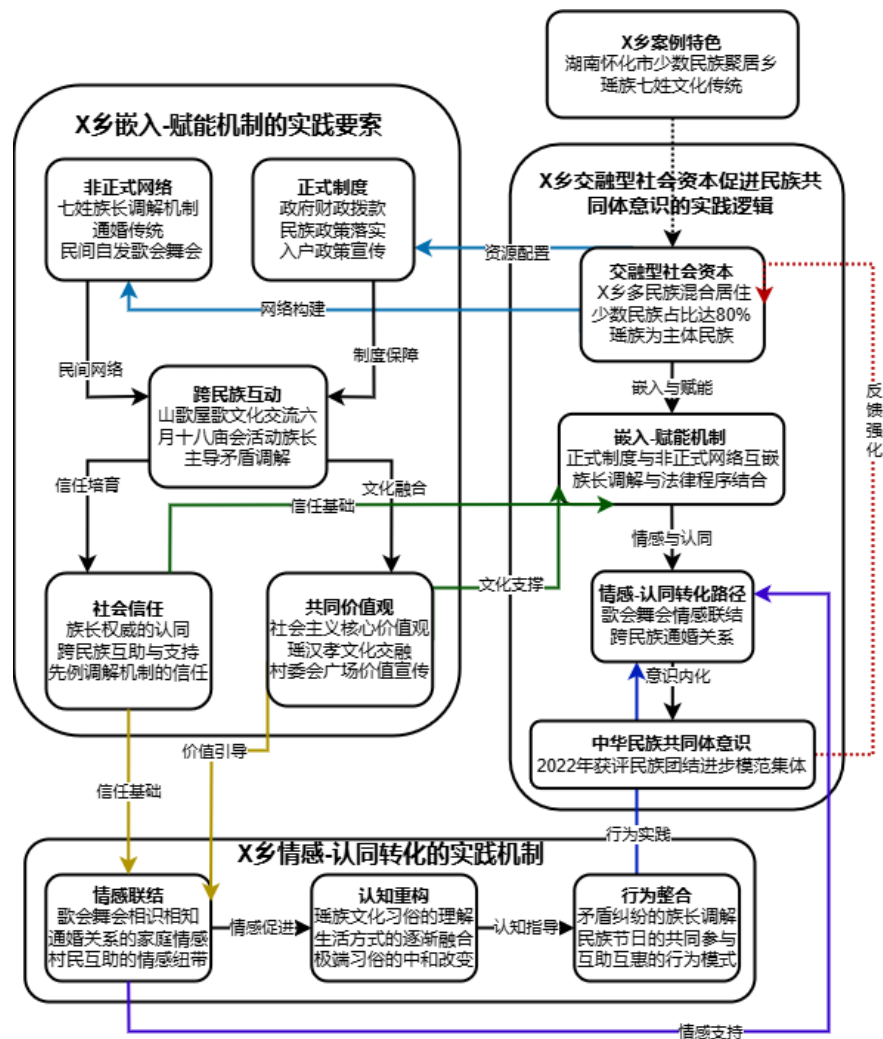


图 5 X 乡交融型社会资本促进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逻辑

4 结语

本文以湖南省 X 乡为实证基点，通过个案分析与理论建构相结合的方法，聚焦交融型社会资本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生成中的微观动力机制，揭示了其从资源嵌入到意识内化的作用路径。前文已对引言、社会资本理论框架、X 乡实践逻辑及“情感—认同转化路径”进行了系统润色，凸显了正式制度（如民族区域自治）、非正式网络（如族长调解与歌会舞会）、共同价值观（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及社会信任在跨民族互动中的交互作用。通过剖析“嵌入—赋能”机制，我们发现社会资本不仅通过制度与网络的深度嵌入促成了信任与文化认同的结构性基础，更以“情感—认同转化路径”为递进逻辑，阐释了认知性社会资本如何通过情感联结、认知重构与行为整合，推动政治、文化与心理认同的“三位一体”统一。这一过程在 X 乡的实践中得以生动呈现，其创新之处在于将社会资本重新定位为兼具文化资源与精神力量的复合性载体，超越传统工具理性框架的局限，为民族团结与社会治理提供了微观路径与理论支撑。

然而，X 乡经验的典型性虽显著，但其作为少数民族聚居区的特殊性——如高比例少数民族人口与地方性治理模式——却限制了研究结论的普适性推广，需在跨区域验证中保持审慎。此外，本问聚焦于挖掘社会资本的正向效应，却对其潜在负面影响，如内群体偏好（in-group favoritism）与排他性（exclusivity）的可能强化，分析不足。例如，过度依赖非正式网络或可固化族群界限，削弱跨民族融合的广度。更进一步，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建构作为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受历史文化（如传统习俗的传承与变迁）、经济发展（如民族地区资

源分配的差异)及政治制度(如民族政策执行的力度与效果)等多重因素的动态交织影响。本文虽初步触及这些维度,但对其相互作用机制的深度剖析仍显薄弱,未能全面揭示其复杂性与多维性。

基于当前研究的不足,未来可以从以下几个方向进一步拓展:首先,选取不同类型的民族地区(如汉族占主导的区域或多民族混合聚居区)进行比较分析,以验证交融型社会资本理论模型的普适性及其适用边界,从而增强结论的广泛适用性。其次,需系统考察社会资本的双重效应,尤其是在资源稀缺或冲突加剧情境下,它是否会催生排他性与分化倾向,进而揭示其作用的条件依赖性。除此以外,可尝试构建一个综合性的理论框架,将社会资本理论与制度变迁理论(如诺斯的制度分析范式)和文化认同理论(如霍布斯鲍姆的民族主义视角)相融合,以更全面地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内在规律与外部驱动。

交融型社会资本作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微观驱动力,其理论价值与实践潜力不容忽视。在新时代背景下,如何通过政策创新(如加强跨民族文化交流)与理论深化(如构建多层次社会资本模型)来培育并激活这一资源,使之转化为共同体意识的内在动力,是理论研究与实践部门共同面临的重大课题。这一问题的解决,不仅关乎学术研究的深入推进,更直接关联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进程以及民族团结的战略巩固。因此,促成理论与实践的良性互动,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微观机制与宏观目标之间实现有效衔接对进一步巩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意义重大。

参考文献

- [1] 罗成. 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召开[EB/OL]. (2014-05-29) [2025-03-19]. https://xj.cnr.cn/2014xjfw/2014xjfwtt/201405/t20140529_515601180.shtml.
- [2] 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 人民日报, 2017-10-28 (04).
- [3] 青觉, 徐欣顺.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概念内涵、要素分析与实践逻辑[J]. 民族研究, 2018 (6): 1-14, 123.
- [4] 陈纪. 论社会交往过程中的和谐民族关系构建——以天津市 A 社区为例[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1, 32 (12): 28-33.
- [5] 陈纪, 曾泓凯.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基于各民族社会资本建设视角[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2, 6 (6): 57-66.
- [6] BOURDIEU P. The Forms Of Capital[M]. RICHARDSON. Handbook Of Theory and Research for The Sociology Of Education. New York: Greenwood, 1985: 241-258.
- [7] COLEMAN J. Foundations of social theory[M].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 [8] PUTNAM R D. The prosperous community[J]. The American Prospect, 1993, 4: 37.
- [9] 黄锐. 社会资本理论综述[J].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报, 2007 (6): 84-91.
- [10] 吴光芸. 培育社会资本, 促进民族和谐[J]. 贵州民族研究, 2007 (1): 7-12.
- [11] 张志泽. 中华民族共同体语境中社会治理共同体建构的认同要素研究[J]. 黑龙江民族丛刊, 2021 (2): 8-16.
- [12] 怀化市统计局. 怀化统计年鉴-2023[M]. 新华出版社[EB/OL]. [2025-03-19]. <https://www.huaihua.gov.cn/tjj/c134105/202401/5d5fdd8abba5414b922dbe2be8e5160a/files/e3107dacflcf4446a7775a121d1010f9.pdf>.
- [13] UPHOFF N T. Learning from Gal Oya: Possibilities for Participatory Development and Post-Newtonian Social Science[M]. London: Intermediate Technology Publications, 1996.
- [14] 罗家德, 赵延东. 社会资本的层次及其测量方法[M]. 李培林, 覃方明. 社会学: 理论与经验.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5: 100-142.
- [15] STOLLE D, HARELL A. Social capital and ethno-racial diversity: Learning to trust in an immigrant society[J]. Political Studies, 2013, 61 (1): 42-66.
- [16]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 想象的共同体[M]. 吴叡人,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
- [17] BHANDARI H, YASUNOBU K. What is Social Capital? A Comprehensive Review of the Concept[J]. Asian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 2009, 37 (3): 480-510.